

《惟清道人帖》考释

戴逢红*

内容提要

惟清禅师系北宋高僧，黄龙禅宗由其法系传入日本，明庵荣西为惟清第六世法孙。黄庭坚的《惟清道人帖》，属主虽是郑郊，但所言均为惟清之事。手牍除书法精美外，文字内容亦十分珍贵：惟清在濒临接手黄龙住持的关键时刻，张商英檄令他出世观音古寺，由此引发一系列纷繁复杂的人事与变故……而由于年代辽邈，这么大一宗公案，却几成历史之迷，引发争议至今。文中笔者紧扣历史脉络，追溯事件根原，缕析人物关系，剖析人物心理，用大量史实对帖文进行了考释与解读，澄清并回答了谁是收帖人、观音寺在哪里、筑庵独住的结果、惟清不愿出世的原因以及黄庭坚写帖的目的等系列疑问。

关键词：黄龙宗 黄庭坚 惟清禅师 无尽居士 观音古寺

诗书双绝、名齐苏轼（1037—1101）的黄庭坚（1045—1105），不仅是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江西诗派”始祖，而且是黄龙宗二祖晦堂祖心禅师（1025—1100）的得法弟子，悟道因缘见于《嘉泰普灯录》《五灯会元》《续传灯录》等。因此殊缘，其诸多书法作品，不惟艺术高蹈，也颇涉宗门人事，于书于史均弥足珍贵。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惟清道人帖》¹，就是典型的例子。

此帖是黄庭坚真迹之一，原件纵29.3厘米、横31.8厘米，共115个字，通篇行宽而字密、长短参差、高低呼应、奇侧相错、端稳紧结、俊健古雅、匠心独运、律韵天成，充分体现了黄庭坚行书的特点与风格，为历代书家和藏家

*男，中国江西人，现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黄龙宗简史》《黄龙宗禅诗》《黄龙宗公案》等，在《法音》《黄梅禅》等发表论文若干。

所珍爱。帖面有鉴藏印如“神游心赏”、“项元汴氏审定真迹”、“神品”、“天籁阁”、“缉熙殿宝”等全印22方、半印5方。乾隆皇帝曾题赞“凌冬老幹、偃蹇岩壑”²，现此赞墨迹及“乾隆宸翰”藏印被挖去，但《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刻本中仍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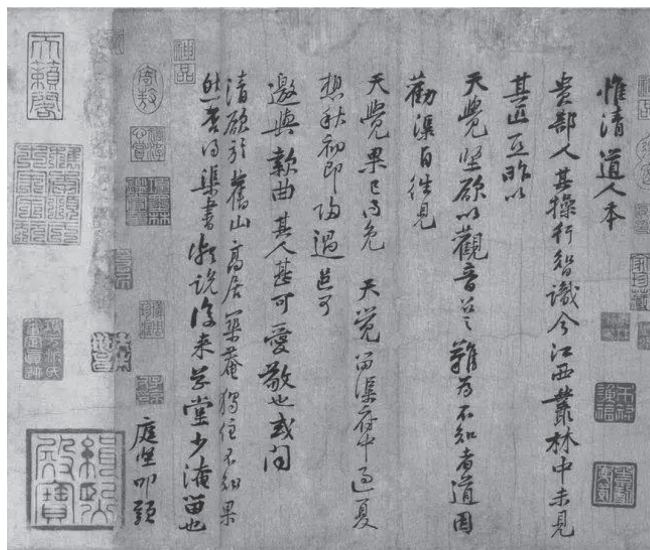
《惟清道人帖》一直以书艺名于世，其史学价值，则因年代辽邈、事迹生僻而几近湮灭。纵观全帖，话仅几句、字才百余，内容却涉及黄龙宗、观音院、高居寺、惟清禅师（？—1117）、郑郊（交）居士（生卒不详）、张商英（天觉）（1044—1121）宰相等纷繁复杂的人与事。

惟清道人，本贵部人，其操行智识，今江西丛林中未见其匹亚。昨以天觉坚欲以观音召之，难为不知者道，因劝渠自往见天觉，果已得免。天觉留渠府中过夏，想秋初即归，过邑可邀与款曲，其人甚可爱敬也。或闻清欲于旧山高居筑庵独住，不知果然否？得渠书，颇说复来草堂少淹留也。庭坚叩头。

以上是《惟清道人帖》全文，翻译成现代文是：

惟清禅师，本是你老乡（武宁人），他的修行、智慧与见识，在整个江西禅林是一枝独秀、罕有对手的。早些时候转运副使天觉居士坚决要惟清出世住持南昌观音古寺，而惟清不肯去，原由又不太好和别人说，因此我劝他亲自前往拜见天觉居士以禀明原委。现在果然因此取消了住持观音之命，不仅如此，禅师还被天觉留在府邸坐夏。我想他秋初解夏后就会归来的，从武宁过时，你可邀请他小住盘桓，他是多么可敬又可爱的人啊。有传闻说他想在老家高居山筑庵独住，不知到底是真是假？收到过他的来信，信中说他会到你草堂稍作滞留的。黄庭坚叩头！

这是元祐七年（1092）夏，黄庭坚在母忧期间写给武宁高士郑郊的一封手牋，目的是通报两人共同的方外好友惟清禅师的情况：时任江西南路转运副使的张商英点名要求惟清住持洪州观音寺，而惟清禅师因为种种原因，不想



也不愿去，在黄庭坚等的规劝下，惟清禅师前往洪州面见天觉说明原因。结果天遂人愿，惟清禅师不仅辞掉了任命，而且还被张商英留在官邸坐夏，朝夕谈经论道。书中黄庭坚估计惟清初秋解夏后就会返回，因此告诉郑郊惟清过武宁时，可留下小住，款叙谈心、宽解劝慰。因为黄庭坚最担心惟清经此波折与变故而心灰意冷，真的到高居山筑庵隐居，因此要郑郊代为留意。

张商英檄令惟清出世豫章观音寺一事，郑郊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或者知道一点但不详尽，作为共同的好友，黄庭坚修此书一是因为惟清告诉了他自己会到草堂，黄庭坚不知郑郊知道否，因此有义务告知；二是黄庭坚担心郑郊对惟清一事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因此特致函说明清楚；其三最重要的是黄庭坚得到传闻说惟清欲于武宁旧山高居隐居，这是黄庭坚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最为担心的，因此他致书要郑郊了解清楚，并尽力劝解，以免传言成真，这是他寄帖的主要目的。因怕郑郊不明此中要害，黄庭坚在帖中还大打感情牌，一起笔就说惟清是你老乡，意思是你俩有同乡之谊，因此也有关心过问之责；其次大赞惟清操行智识，旨在提醒郑郊要高度重视，如此高

才大德，世所罕见，不能任其自行湮灭。在一封手牍中如此煞费苦心地斟字酌句，这在黄庭坚来说是很少见的。

手牍不长，文字亦浅显，但帖中内涵，却少有人能察其详，反倒多生疑窦：如谁是收帖人？观音寺在哪里？张商英为什么要惟清出世观音寺？惟清又为什么坚辞不往……等等，短短百十字，可谓波谲云诡、迷雾阵阵，疑情不仅困扰书法、文史两界近千年，而且至今未有确解、常存争论，由是笔者不揣冒昧，斗胆考证释读，冀白真相于今朝。

一、收帖人与高居筑庵

众所周知，宋代的信牍，是装在封袋里的，款识写于封袋上，信牍封袋浑然一体，类似于当时的拜帖。因为封袋上有收帖人名，因此正文中就少有再写称呼的。这在当时没有问题，但年深月久封袋破损或遗失后，就让很多信牍的收件人成为历史疑团，文中的《惟清道人帖》就是这样，到底谁是收帖人？就让后人大费周章，甚至至今仍在争议、未有定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一是历代的黄庭坚文本，从宋乾道本《豫章黄先生文集》³到明弘治、嘉靖递修本《黄先生全书》⁴、再到光绪二十年（1894）的《宋黄文节公全集》⁵，直至今日如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黄庭坚全集》⁶和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⁷等，有的收录了此帖，有的没有收录，而即使收录了的，也没有关于收受人的信息记录；二是所有黄庭坚的年谱，从宋代山谷先生的侄孙黄耆编的《山谷先生年谱》⁸起，到近人张传旭的《黄庭坚年表》⁹、郑永晓的《黄庭坚年谱新编》¹⁰，亦大多没有此帖的记载，即使有也没有收受人的介绍说明，甚至其撰写时间也五花八门、因人而异，如水赉佑、张传旭先生认为该帖写于绍圣元年（1094），而黄君先生则认为写于元祐八年（1093）；三是黄庭坚的书法集，从清代的《三希堂法帖》¹¹到刘正成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¹²、周炯主编的《中国墨迹大全》¹³，再到汕头大学出版社的《黄庭坚书法集》¹⁴、黄君主编的《黄庭坚书法全集》¹⁵等，均无此帖的收受人介绍与记录；四是武宁县从明嘉靖四十一年

(1562)至当代2008年共八修县志,从古迹、艺文、寓贤、寺观、仙释等有关山谷、郑郊、惟清的记载多达数十条以上,甚至如《与分宁萧宰书》¹⁶,本是写与邻县县令萧从的手牍,仅因言及惟清都在收录之列,可事关惟清的《惟清道人帖》却意外地没有收录,好像此帖不是写给武宁人,甚至与武宁人毫无关系似的,这当真令人大惑不解……以上情况充分说明,《惟清道人帖》自古以来其收受人就一直模糊不清,没有考证明白,以至今日对收受人的认定,仍是见贤见智、莫衷一是、难以定音,如水赉佑先生于2001年撰文说“此帖是山谷向其友人张商英介绍惟清道人的一封信札”¹⁷,陈志平教授则于2005年断言“收信人可能就是当时武宁宰吕晋父”¹⁸,而傅红展馆员又于2012年提出了郑郊是收受人的新见。

那么收帖人是谁?到底是不是郑郊呢?针对这些疑惑,在此我结合帖文与相关史料进行如下考释:

第一从帖文中“惟清道人,本贵部人”,可以知道收帖人应该与惟清系同乡,均为江西省武宁县人。而武宁恰好有一个郑郊,清代乾隆二十年《武宁县志》¹⁹载:

郑郊,字子通。襟期清旷,志行纯洁,慕周茂叔为人,凿池种荷花为乐。每天气清爽,纵鸳鸯池中,往来披拂,五色相乱。郊饮酒赋诗其间,悠然有尘外之想。黄山谷诗云:“鸳鸯终日爱水镜,菡萏晚风凋舞衣。”皆实录也。郊与山谷及清上人忘形交,山谷访清上人,过郊草堂,因相传为草堂山人。

从县志记载的情况看,这个郑郊是符合武宁同乡这一要素的。

第二从帖中语气可以看出,黄庭坚与收帖人关系密切、交情深厚,这从帖中透露秘密——“难为不知者道”、运用祈使句——“可邀与款曲”以及互通信息——“得渠书,颇说复来草堂少淹留也”等可看出,他们的关系不仅好,而且已到了稔熟随和的程度了,这与县志中“郊与山谷及清上人忘形交”的说法也是吻合的,另外山谷道人的《赠郑郊》²⁰一诗,更是其与郑郊深情厚谊的铁证。其诗为:

高居大士是龙象，草堂丈人非熊黑。
不逢坏衲乞香饭，唯见白头垂钓丝。
鸳鸯终日爱水镜，菡萏晚风凋舞衣。
开径老禅来煮茗，还寻密竹迳中归。

第三赠诗及帖中均提到了“高居”、“草堂”，这与县志中的草堂也是吻合和一致的。这里的“高居”、“草堂”既是地名，也是寺名或堂号名，同时也可能是代指的当事人，如高居在帖中指的是地名即武宁县年丰乡（今船滩镇）的高居寺，而在诗中却又代指惟清禅师；草堂也一样，在帖中指郑的居住之地，而在诗中则代指郑郊居士。这在古书尤其是禅宗典籍里，是很常见的事，如黄龙二祖宝觉祖心禅师晚年在寺内西花园建室自住，取室号为“晦堂”（此为中国禅师以堂号命名之始），后世诸籍即以“晦堂”、“晦堂和尚”、“晦堂祖心”等代指宝觉禅师了。因此帖中“复来草堂少淹留也”，既可说是惟清会到草堂这个地方，也可说是惟清会到你郑郊这里，两种理解意思都不错，效果都是一样的。而关于草堂即为郑郊的居所，亦代指郑郊本人这一点，黄庭坚在《跋荆州为兴上人书<赠郑郊>诗》²¹中说得很清楚：

癸亥岁，予解官太和，过武宁，闻清上人当来延恩，因谒郑子通问消息，题诗子通之壁。草堂，郑郊处士隐处也。

因为黄、郑、清三人为至交，清回武宁断不会不联系郑，因此黄听闻清禅师去了延恩寺，即到郑处探问消息，并将上诗题于草堂壁上。此跋进一步证明了黄、郑、清三人长久而亲密的关系与情谊。跋中之延恩即延恩寺，与高居寺俱在武宁，惟清在高居寺戒禅师处受戒后，既往延恩寺依法安禅师，数年后才开始行走江湖、参请诸方的。这在《跋招清公诗》²²中有说明：

草堂，郑郊处士隐处也。小塘芙蓉盛开，使鸡伏鸳鸯卵，与人驯狎不惊畏。老禅延恩长老法安，师怀道遁世，虽与慧林本、法云秀同师，颇以讨饭养千百闲汉为

笑也。清公少时盖依之数年,尝教诲道:“俗云:‘万事随缘,是安乐法’”清公云:“如安禅师,心无简择,可爱可钦。”舟中晴暖,闲弄笔墨,为太和释智兴书。

另乾隆四十七年《武宁县志》²³中,亦有“郑氏草堂”条:

宋处士郑郊别业也。在县治东五百步金鸡桥侧。郊好学乐贫,种芙蓉千叶,中养鸳鸯,两两浮水上,驯挠如家畜。黄庭坚时相过从,有诗云:“鸳鸯终日爱水镜,菡萏晚风凋舞衣。”详见《豫章集》。今池已为溪水冲溃,犹呼荷花塘云。

以上诗、跋与志均明白说明,草堂系郑郊隐士的居所,也是黄山谷与灵源惟清禅师频来之处,同时也印证了黄、郑与清之间非同一般的交情,加上书中“旧山高居”、“复来草堂”等语,可以百分之百地断定,手牋的受主即收帖人确系郑郊无疑。因此也证明,傅红展先生的说法是正确的。

而“高居大士即惟清”的认定,除上述渊藪外,亦有许多史料为证,如惠洪的《昭默禅师序》²⁴:

公名惟清,自号灵源叟,世为洪州武宁陈氏子。童子时诵书,日数千言,伊吾上口。有异比丘过书肆,见之引其手熟视,大惊。劝其父母使出家,公即忻然往依高居某为师,几何为僧,受具足戒,即起游方。

序中说惟清最先在高居寺出家,并在那里受具足戒。相同的说法亦见于黄庭坚的《与欧阳元老》²⁵帖中:

清公归所受业院,武宁之高居,想甚得所也。

文中说惟清的受业所,即最先出家受戒之地为武宁高居。而在《与死心道人书》²⁶中,亦提到惟清与高居寺的关系:

兴、住在彼否？此两道人却需要大剥净，未审如何？清公到高居，计无不安稳，亦颇为衲子追逐耶？然已是名满天下，恐终不得闲耳。

以上史实皆证明惟清与高居的关系既频繁又密切，当然高居寺既在惟清禅师家乡，又是其剃度之所，其深厚情感和依赖程度自非他寺能比。另外，他与高居寺的密切联系，从他的书尺《答高居山主》²⁷中也可窥见：

示谕，甚荷远忧，然服药多种，而切验其效皆在时节之自然耳，故且置服食而任吾缘之如何也，况不坚之物岂复久长？世人贵末弃本，故区区百年泡幻之质，作诸计较而终不免败坏沉堕。以是推之，则吾如来藏中无相灵丹，若能炼服，纵捐百千幻身，则吾不病也。漫此奉报，若能于中取效，却是世间妙方也。

正因为高居在惟清心中难以替代的地位，因此经历了檄令出世观音的波折后，在身心疲惫、心意茫然之际，欲到此寻求情感皈依与庇护，实乃人之常情，这就是惟清禅师萌生到高居筑庵独住的原因。

二、观音寺与檄令出世

我们先来读惟清禅师的诗《辞张无尽请住豫章观音寺》²⁸：

无地无锥彻骨贫，利生深愧乏余珍。
鄮中大施门难启，乞与青山养病身。

诗句简单直白，而且不用看诗句，单从题目就知道写诗的目的。看到这首诗，人们不禁要问：豫章观音寺有啥来头、为什么张商英要请惟清禅师去住持、惟清禅师为什么又要推辞不肯听命等等。按史料记载，当时张商英态度坚决——“公檄分宁邑官同诸山，劝请出世于豫章观音，其命甚严”²⁹，有

不容分说、刻不容缓之势。一个是朝庭命官，一个是化外高僧，一个要去，一个不从，当时之势，形同水火，很有剑拔弩张的味道，这就是惟清禅师写作此诗的实情。惟清禅师写这首诗用的是柔劲，以弱示强，祈求张商英的谅解，因此诗句写得可怜巴巴，颇有老气横秋、行将就木之感。实际上从黄庭坚于元佑七年（1092）说惟清禅师年少，加上他政和七年（1117）灭寂的情况来看，其时正是壮年之期。从实际效果来看，此诗的作用并不大，因为在此诗之后，张仍严飭惟清禅师到任。

下面我们来弄清豫章观音寺的来龙去脉与前世今生，好明了张商英要惟清去住持的原因。据清代史学家陈弘绪（1597—1665）考证，观音寺“在蓼洲，晋初建，今已久废”³⁰。蓼洲即古谷鹿洲，在南昌城西南，今惠民路西。据四库本《水经注》载：“赣水又经谷鹿洲，即蓼子洲也，旧作大偏处。”此处三国时是吴国大将吕蒙（178—220年）造大船的所在。据说建于晋初的观音寺，是南昌城内历史上的第一座寺庙，地位很高，驻锡的高僧也很多，如汾仰祖师之一的仰山慧寂禅师（840—916或804—890）、德山高徒岩头全赧禅师（？—887）等。应该说豫章观音寺来头不小、名气很大，但“今已久废”四字，昭示此寺在明末清初时已然颓败。当然，从相关的记载来看，观音寺在唐宋之时应该还是较兴旺的。只是宋明时期，洪州城市中心的东移北进，加上唐末宋初豫章西山寺庙群的兴起，偏处蓼洲南端一隅的观音寺，从宋代开始就日薄西山、渐露颓相。作为北宋中期著名的相公居士，南昌城寺庙之最观音寺的分量，他自然是知晓并有数的，因此重振观音雄风、以立不世功德，或许正是他发下的宏愿或新政之举呢。

要实现这个宏愿，首要一步当然是找一个好住持，这就涉及到张商英为什么要找惟清禅师这个问题了。“夫住持者，先弘道德、后具因緣，内明佛法之机、外赴群生之望”³¹——这是黄龙宗祖师慧南（1002—1069）之语。住持要内明佛法、外赴群生，这道理慧南禅师知道，张商英自然也明白，而他对江西丛林的了解，这样的人选自然非灵源和尚莫属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先了解一下惟清其人：

惟清，字觉天，号灵源叟。生南州武宁陈氏，方垂髫上学，日诵数千言，吾伊上口。有异比丘过书肆，见之，引手熟视之，大惊曰：“菰蒲中有此儿耶？”告其父母，听出家从之，师事戒律师，年十七为大僧。

……

公风神洞冰雪，而趣识卓绝流辈，龙图徐禧德占、太史黄庭坚鲁直皆师友之。其见宝觉，得记荆，乃公为之地。宝觉钟爱，至忘其为师，议论商略如交友，诸方号“清侍者”，如赵州文远、南院守廓。³²

这是“禅门司马”惠洪（1071—1128）的记录，而仲温晓莹（1122—1297）笔下的惟清则与惠洪的如出一辙：

灵源禅师早参承晦堂于黄龙，而“清侍者”之名著闻丛林。³³

以上资料中，惠洪是灵源的同宗师兄弟，仲温晓莹则是灵源孙辈后人，他们一个与灵源处于同一时期，相识、相交并相知；而另一个则异辈隔代，既不相识、也不相交，但他们的评价描述却惊人地一致，因而可信度很高。而且从他们的记录中可以看出，灵源和尚其时正为一代宗师晦堂祖心的侍者，虽名为侍者，但深得祖心器重和赏识，与祖心是亦师亦友、等而论道的关系，“清侍者”之名因而著闻丛林。也就是说，惟清此时已具备了作为一个好住持的两大要素：一是出身名门，二是名满天下。当然单有出身和名气是不够的，以张商英的才情与眼光，必然会考察其修行与能力，而惟清的修行能力若何呢？先来看黄庭坚的评价，其在《惟清道人帖》中说：

其操行智识，今江西丛林中未见其匹亚。

而在《僧惟清帖》³⁴中又说：

此僧真法器，规摹宏远，但年少，自以少磋锻之功。

另在《答徐甥师川》³⁵中更是盛赞：

太平清老，老夫之师友也。平生所见士大夫，人品未有出此公之右者。

我们知道，黄庭坚不仅是两榜进士出身的朝廷命官，还是“诗书双绝”、名满天下的文人，最重名节与清誉，连他都推崇备至、赞不绝口之人，其操守、德行与能耐到了何等地步，是可以想见的。也就是说，灵源不仅名著缙素，而且道望四驰，其人品操守早为世所重。要知道，黄龙可是北宋真宗皇帝赐名的寺庙，领袖群伦的大丛林，是当时禅宗的中心。而灵源之师作为祖师慧南的嫡传，在慧南之后住持仅十二年，就五辞而得脱，从此独居“晦堂”二十年不出：

师住持十有二年，性真率，不乐事务，凡五辞乃退。揭其室曰：晦堂。³⁶

也就是说作为天下第一丛林的黄龙寺竟然近二十年没有住持，期间实际主事的就是灵源惟清禅师，这充分说明惟清禅师的组织管理能力是出众的、让人服膺的。连其大师兄死心禅师（1044—1115）住持云岩禅寺时，派遣弟子跟去帮忙这样的事都是由灵源来作安排，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迨死心禅师出世云岩，灵源遣二三子，往佐之。³⁷

这说明无论从师承、名气，还是修行、操守、能力来讲，惟清禅师都是符合一个住持的要求的，如果说还有什么硬性条件的话，那就是年龄。年龄虽然不起决定性作用，但也很关键。那么其时灵源和尚年岁若何呢？由于史佚惟清生年，其年龄问题至今成谜，但在黄庭坚写给武宁县宰吕晋夫的《僧惟清帖》中，却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

庭坚叩头：僧惟清者，闻府中虚观音法席而召之，诚为德举。此僧真法器，

规摹宏远，但年少，自以少槌锻之功，方欲调心养道，极古人之门户。辄欲以病自陈，幸府中垂听，君子成人之美，谅诸公必以为然。恐见漕台及府座，幸为道此。庭坚叩头。

帖中不仅直奔主题，请求县宰有机会就向张商英及知府等“幸为道此”帮忙求情外，而且在帖中黄庭坚说惟清“但年少”，而此帖作于元佑七年（1092）春，是年黄庭坚四十八岁，由此推断惟清是时应在四十岁以下，最多不会超过四十岁，否则黄断断不会将“年少”一词，安在一个四十岁以上，与自己年岁相仿的中年人身上的，哪怕有再大的开脱之需与及乌之爱在内。由此可知，惟清此时正处年富力强的壮岁阶段，正是成就事业的黄金时期，由此也让人不得不佩服张商英独到的择人眼光！

当然人们不禁要猜测，对惟清禅师的底细，张商英何以如此清楚？这就要从张商英与黄龙宗的渊源说起了，《罗湖野录》卷四载：

无尽居士见兜率悦禅师，既有契证，因询晦堂家风于悦，欲往就见。悦曰：“此老只一拳头耳。”乃潜奉书于晦堂曰：“无尽居士世智辩聪，非老和尚一拳垂示，则安能使其知有宗门向上事耶？”未几无尽游黄龙，访晦堂于西园，先以偈书默庵壁曰：“乱云堆里数峰高，绝学高人此遁逃。无奈俗官无住处，前驱一谒散猿猱。”徐扣宗门事，果示以拳头话，无尽默计不出悦之所料，由是易之，遂有偈曰：“久响黄龙山里龙，到来只见住山翁。须是背触拳头外，别有灵犀一点通。”灵源时为侍者，寻题晦堂肖像曰：“三问逆摧，超玄机于鹫岭。一拳垂示，露赤体于龙峰。闻时富贵，见后贫穷。年老浩歌归去乐，从教人唤住山翁。”³⁸

可见无尽居士张商英不仅是黄龙宗三世兜率从悦禅师（1044—1091）的弟子，而且到过分宁亲谒黄龙寺、谨礼祖心禅师，不仅与惟清见过面，从惟清“寻题”晦堂肖像来说，还颇有不满张之诗偈，遂以题跋的方式与张进行了无声的对决，尤其是“从教人唤住山翁”七字中，明显表露了对张的不满、

甚至于不屑。所谓不打不相识，惟清与张商英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从相识到相知的，从张点名要求惟清住持观音来看，惟清已然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基于对惟清的全面了解和仰慕之情，加上振兴观音古寺的迫切心态，檄令惟清禅师出世，自然成为张商英的首选与不二之选了。

三、留过夏与坚辞住山

前面说过，观音寺是豫章城区历史上最早的寺庙，驻锡过很多高僧大德，如今又是大权在握的转运使出面相邀，而且还请县邑官吏及诸山长老共同相劝，面子可谓给到了家，而受邀的惟清仅是一个侍者，当时连首座都还不是。按理，对方尽了如此礼仪，惟清也应该顺坡下驴，给人方便亦图自己方便。但不承想，惟清就是不卖这个账，任你张商英如何催促、如何急切，恁是坚执不从，不给对方面子，先是移居兴化，再是装病，然后又写诗，同时托人说情，当时恰逢黄庭坚母忧在家，从目前已有的史料来看，黄庭坚是为惟清出了力、操了心、说了情的，《僧惟清帖》和《与兴化海老帖》就是证据。至于其他人如朱京（1038—1101）、朱彦（1055—1122）兄弟等，他们既是惟清的好友，也是朝庭命官，像朱京世昌其时正为湖北京西江东转运判官，离分宁很近，而朱彦世英其时任舒州司法参军，距分宁亦不远，到底有没有为他说情，我们没有证据不敢妄言。而门徒陈莹中（1057—1124）、戴道纯（生卒不详）等，其时虽然为朝庭命官，但一因他们年少位卑，二是他们拜惟清为师极有可能在此事之后，这里就姑且不论了。

在此要说的是，黄庭坚除献计献策、多方请托之外，有没有直接向张商英陈情呢？虽然缺少实证，但这是很有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黄、张年龄相若、又俱为黄龙居士、还同为元祐党人，相同的年纪、身世与经历，让他们多有共同语言；二是元丰年间，黄张同朝为官，一个是秘书省校书郎，一个是开封府推官，此时二人就多有交集，且其情甚浓。元祐二年（1087）张商英提点河东路刑狱，黄与苏轼、张耒等为他践行，还作有《送张天觉得登字》一诗；而此前一年，张至分宁、宿兜率、谒黄龙时，就极有可能拜访过黄家，

虽然其时黄庭坚母忧，正在扶柩回家的路上。但张《黄龙崇恩禅院记》³⁹中有“我行双井，至于查田。升太平之岭，望幕阜之巅”等句，双井是黄庭坚老家，张既然从双井过，按常理一定会例行拜访的。以上都向我们透露和说明，黄与张渊源颇深、关系不薄，因此是极有可能直接向张商英开口说情的，只是信牒是专程送达，还是由惟清自带，没有实物不好妄断罢了。

至于惟清坚执不去观音的原因，细心的读者可能上面《惟清道人帖》中就发现了端倪——“难为不知者道”——有何为难？何事为难？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向前回溯，前面我们说过，熙宁二年（1069）黄龙祖师灭寂，晦堂祖心接任住持，十二年后即元丰四年（1081）五辞得退，从此直到绍圣四年（1097），百丈元肃（生卒不详）来黄龙接替住持，前后十六年黄龙寺没有主僧。这十六年里黄龙寺的一应事务，均是惟清以侍者和首座的身份在打理，而且打理得还不错，起码老住持祖心满意、寺众服帖、官府无话。前面也说了，黄龙寺在当时是天下学子归趋的丛林之首、学术中心，虽然观音寺也是名刹古寺，但毕竟颓败待兴，如何能与如日中天的黄龙同日而语？况且黄龙主僧之位其时（1092）已空十二年，这期间祖心的大弟子、名满江湖的死心悟新一直在寺且快五十岁了，但祖心和尚硬是啥说法也没有——明眼人都清楚：祖心之意在灵源也！也正是自知住持黄龙无望，死心禅师才于是年出世本邑云岩寺，前面说过随从辅佐的弟子都是惟清安排的。也就是说惟清接任黄龙最大的障碍已离开或即将离开，正是住持之任指日可待之时，张商英凭空一杆子，将一盘好棋全搅了。斯时斯境、于情于理，能说惟清心中不起些微波澜？没有一点想法？惟清又如何能做到一口应承、欣然赴请？即使住持黄龙非其所愿，他又如何对得起师傅晦堂的栽培和师兄死心的成全？

应该说惟清此时的处境相当微妙，去吧非其所愿，不去吧事涉官命，稍有不慎就将万劫不复。此之情形、个中机缘，包括惟清的内心想法，黄庭坚是洞若观火、一清二楚的，而且他的态度应该是支持惟清的，甚至于可能他就是惟清的幕后之主，百分之百地他是不赞成惟清舍本逐末去观音寺的，不然他也不会四处出面为惟清脱身说情，因此他在给武宁县宰手书的同时，也有手牒送达诸山长老，如《与兴化海老帖》⁴⁰：

承观音虚席，上司甚有意于清兄。清兄确欲不行，亦甚好。蟠桃三千年一熟，莫做退花杏子摘却。此事黄龙、兴化亦当作助道之缘，共出一臂，莫送人上树拔却梯也。

黄庭坚之所以致信这些人，是因为张商英“檄分宁邑官同诸山，劝请出世于豫章观音”，张既然请这些人劝请，想必也会征询听取他们的意见，这就是黄庭坚致书给他们的原因。而且书中很直接，均有要求为惟清脱身助力之请，如致武宁县宰帖中“君子成人之美，谅诸公必以为然。恐见漕台及府座，幸为道此”、与兴化海老（生卒不详）帖中“此事黄龙兴化亦当作助道之缘，共出一臂，莫送人上树拔却梯也”等，从书中已提及黄龙，再虑及黄龙和晦堂的影响，又惟清乃黄龙寺僧来看，张商英一定会尊重考虑黄龙的意见，因此黄庭坚一定会致信甚或亲自上门做晦堂的工作，要知道晦堂也是黄庭坚的师傅啊，而且黄庭坚到处修书托人为惟清求脱，十有八九就是和师傅晦堂相商后的结果。书中虽然黄庭坚只提到黄龙、兴化，但既然张是“檄分宁邑官同诸山”，则黄庭坚一定会同时向当时分宁的名刹如宝山、兜率、云岩、玉溪、法昌等诸寺长老修书的，因为考虑到惟清系黄龙寺僧而寓居兴化，则上述诸山的意见，反而要比黄龙、兴化更客观和更具说服力呢。

其中特别是兜率禅寺，既是张的悟道之处、印证之所，而且他与其师从悦禅师交往时间虽短，但感情深厚。虽然从悦已然灭寂，但以从悦年前十一月初三坐化推算，距此不过三四个月的时间，正是无尽心悲情浓之际，也正是兜率打感情牌的最佳时机——这从之后张对兜率一众师兄的眷顾、为从悦申请谥号、遣使持文拜祭，甚至其谪居荆州时，大慧宗杲（1089—1163）求其为湛堂文准禅师（？—1115）作塔铭，他都看在文准、宗杲曾为兜率寺僧的面上一口应承——因此说其时的兜率住持慧照禅师（生卒不详）肯定收到过黄的手书的。另张檄分宁而未檄武宁，而黄庭坚仅因惟清俗籍武宁乃致书其宰，那作为当事之所在、檄令之受主的分宁县宰呢，按理黄庭坚一定有手牍送达，或者也与黄龙寺一样，出于礼貌与重视，况且双井离县城亦不远，黄庭坚是亲自登门求情的也未可知。

那么惟清在黄龙“代理”住持干得好好的，张商英作为同门与好友，不说助力转正也就罢了，为何要釜底抽薪，关键之时横插一杆呢？是另有隐情，为他人腾位子、清障碍呢，还是真的对黄龙实情懵懂无知，一心只为观音寺谋划大德呢？当然，以张商英少年得志、敢做敢为、豪气干云的性格和做派来看，其檄令灵源出世观音的目的，应该很干净，没有私心杂念。因为就黄龙而言，惟清之后就是死心，而死心与张商英交往很少，反而是与灵源交往频繁、感情浓稔，而且从后来张商英与黄龙的瓜葛来看，也没有这方面的蛛丝马迹，甚至其绍圣三年（1096）十月重返江西权知洪州，此时惟清正住持舒州太平寺，黄龙连代理住持都没有，此时作为地方长官，他向黄龙推荐的人选竟然是晦堂祖心的同门师弟、百丈禅寺的住持元肃禅师，其原因是元祐六年（1091）当阳玉泉寺承皓禅师（1011—1091）因年老而向张荐元肃禅师自代，张劝喻过元肃但元肃未从，虽然如此，但张由此记下了元肃禅师，因此才有了绍圣四年（1097）元肃的黄龙之行。可以说在诏令灵源赴观音这件事上，张几乎是毫无心机，一心想着光大观音古寺，满门心思全在僧中之龙灵源身上，丝毫没有虑及黄龙的枝枝蔓蔓、七孔八穴。当然这也是官员们的通病，平日颐指气使，多惯出刚愎自用的毛病，遇事往往一意孤行，不虑及他人的感受，因而经常事与愿违、好心办坏事。

最后的结果也印证了这点，诏赴观音一事，灵源虽移了居、装了病，也写诗表露了心迹，同时邑官县宰、诸山长老以及黄庭坚、朱世英兄弟等可能都为惟清说了话帮了忙，但这些毕竟敲的只是边鼓、唱的只是插戏，正主张商英不收回成命，事就不算完。而这些边鼓敲的都是场面上的话，真正的原因又“难为不知者道”，外人自然也无由知之。黄庭坚作为官场中人，深谙官人好面子的禀性，尤其像张商英这种高调之人，因此他建议惟清拜见张商英，当面对情、禀明原委，以争取张的谅解，收回成命。从黄庭坚帖中我们得知惟清“果然得免”，这一方面说明张商英在诏令惟清这件事上真的没有私情，有的只是为观音寺选高人，有的只是对惟清的赏识，因此张不仅撤了诏令，而且留他府中安夏，关爱之情、殷殷之望，溢于言表、流于行间；另一方面也说明灵源的脱身计策方向正确，诸种措施得力、效果显著，当然至于惟清

去洪州之时，有没有另带晦堂、县尹等的私笺公函，就不得而知了。

檄令出世观音一事就这样结束了，对张商英来说，是另选一住持的事；可对灵源来说，却是喜忧参半，一方面是达其所愿，辞去了观音之命，但另一方面黄龙大好的局面亦因此黄了。经此波折与变故，灵源心态颓丧、斗志低落是肯定的，而且为防觊觎主僧之物议，他连黄龙都不方便回了。在这种情形下，欲往高居筑庵独住，应该说有其真实的一面，是其真实心态的反映；也有试探的一面，是其向外界发出的探测信号。做为好友兼道友的黄庭坚自然是希望他回到黄龙继续履职并最终执掌佛帛的，最怕的是他从此一蹶不振，真的隐居独处、泯然于众。因此他在书帖中，嘱托共同的好友郑郊鼓励规劝，以期重振雄风，这就是黄庭坚写此手牋的背景与缘由。

但是，黄庭坚的希望是注定要落空的，因为那怕之前真有让惟清住持黄龙的意思，但现在无论是鉴于惟清的拒绝行为，还是碍于张商英的情面，官府都会收回成命，最起码也会将事情搁置拖延；当然，同样碍于张商英情面，倒也不会马上另请高僧住持黄龙的。事情的发展也正是这样，黄龙住持之位，直到绍圣三年（1096）张商英重返洪州任知府时，还一直空缺，最后还是由他于绍圣四年（1097）初，强使百丈寺住持元肃禅师兼任黄龙寺住持，才结束了黄龙群龙无首的窘境。而灵源自洪州返回后，在高居住了一段时间，即被晦堂召回黄龙充任首座，直至应提点淮西刑狱使朱京世昌之请住持舒州太平寺，并于元符二年（1099）由洪州转运使王桓（生卒不详）迎归，才继元肃之后正式接任了黄龙住持。

四、结论

如上所说，《惟清道人帖》文字虽少但内涵丰富，不仅涉及人物多、时间跨度大、活动地域广，且人物中有官员、僧人、居士，地域从乡村到城市，地址从官衙到堂室，又所言之事明暗相掺、公私相杂，既涉及个人前途命运、理想意愿，又关系宗派传承、寺庙兴衰，若不深入分解、详加剖析，是很难洞其幽微、察其玄妙的，因此此帖不惟是书法艺术精品，其文史价值也珍贵

异常，是研究黄庭坚、了解黄龙宗与是时宗教社会、官场民情等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黄庭坚留下的诸如此类的手牍，并非仅此一帖，相反还有很多，都蕴藏丰富而疑点重重、内容成谜，如《与本州太守》⁴¹中的太守是谁？《与云岩禅师》⁴²写于何时？《与观音院长老》⁴³是哪座观音院的哪位长老等等，都有待我们考释去疑、还原真相。当然，解读之法最好是能系统为之，以便彼此应证、互为说明；而在考释之时，要有机结合宋代官史、山谷年谱、禅宗典籍、寺庙宗谱、禅师语录以及地方方志等，同时查阅参考文人如苏轼、苏辙、徐俯、洪驹父兄弟、李清老、欧阳元老、刘克庄、陆游、朱时恩等及僧人如慧南、祖心、死心、惟清、慧洪、法云、智兴、礼思、佛海、法镜、栖贤和尚、大慧宗杲、云卧晓莹、长宁守卓、浑朴道古等的著作、诗文、书札、信函、简尺、集成、注解、碑刻、金石等，以鉴真识伪、钩沉史证，使考释的结果更趋客观、真实、准确，达到纠错正讹、厘清真相、正本澄源之目的，裨益黄庭坚、黄龙宗、乃至宋代宗教人文的研究与发掘。

【注释】

- 1 傅红展编：《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书法编》第2册，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第174页。
- 2 [清] 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第十三册，乾隆十五年（1750）镌刻拓本，原石现在北京北海公园。
- 3 [宋] 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据嘉兴沈氏藏宋本缩印。
- 4 [宋] 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别集二十卷、简尺二卷、词一卷》，明弘治十八年（1505）叶天爵初刻、嘉靖六年（1527）乔迁、余载仕重刻，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
- 5 [宋] 黄庭坚：《宋黄文节公全集》，清光绪二十年（1894）江西义宁州署刻，刻本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 6 [宋] 黄庭坚著，刘琳、李勇先、王蓉贵点校：《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 7 [宋] 黄庭坚著，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9月版、2011年9月修订版。

- 8 [宋] 黄簪:《山谷先生年谱》,《丛书集成续编》第262册第67—175页,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15年3月影印。
- 9 张传旭:《中国书法家全集·黄庭坚》,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 10 [宋] 黄庭坚著,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 11 [清] 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第十三册,乾隆十五年(1750)镌拓本。
- 12 刘正成编:《中国书法全集》,荣宝斋出版社,1991年版。
- 13 周侗编:《中国墨迹大全》,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9月版。
- 14 [宋] 黄庭坚:《黄庭坚书法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版。
- 15 黄君编:《黄庭坚书法全集》,江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 16 [清] 邹应元纂:《乾隆二十年武宁县志》卷二十七,引自武宁县志编委会编《明清武宁县志汇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
- 17 水赉佑:《黄庭坚作品考释六则》,《中国书法》2001年第4期,第21页。
- 18 陈志平:《黄庭坚书帖考三则》,引自黄君编《黄庭坚研究论文选》第3卷,书法、综合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版,第1570—1583页。
- 19 [清] 邹应元纂:《乾隆二十年武宁县志》卷十七,第236、237页。
- 20 [宋] 黄庭坚著,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上册,第344页。
- 21 [宋] 黄庭坚著,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中册,第1238页。
- 22 [宋] 黄庭坚著,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中册,第1223页。
- 23 [清] 梁鸣冈编:《乾隆四十七年武宁县志》卷九,引自武宁县志编委会编《明清武宁县志汇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4页。
- 24 [宋] 惠洪著,(日)廓门贯彻注:《注石门文字禅》(下册)卷二十三,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384页。
- 25 [宋] 黄庭坚著,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中册,第1220页。
- 26 [宋] 黄庭坚著,刘琳、李勇先、王蓉贵点校:《黄庭坚全集》第3册,第1850页。
- 27 [宋] 灵源惟清:《灵源和尚笔语》,日本寺町藤屋三郎兵卫,(日)江户时代(1603—1867)刻印,第49页a面。
- 28 [宋] 晓莹撰:《罗湖野录》卷一,引自于亭译注《禅林四书》,湖北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6页。
- 29 [宋] 晓莹撰:《罗湖野录》卷一,第266页。
- 30 [清] 陈弘绪等撰,段晓华点校:《江城名迹记·江城名迹记续补三种》,江西

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6页。

- 31 [宋] 慧南著，尧山僧守素编：《集洪州黄龙山南禅师书尺集》，日本京师寺町松原下田中甚兵卫，（日）延享元年（1744）刊印，第2页b面。
- 32 [宋] 惠洪著，吕有祥校注：《禅林僧宝传》卷三十，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12页。
- 33 [宋] 晓莹撰：《罗湖野录》卷一，第266页。
- 34 [宋] 黄庭坚著，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中册，第666页。
- 35 [宋] 黄庭坚著，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中册，第1038页。
- 36 [宋] 雷庵正受辑，李俊红点校：《嘉泰普灯录》卷四，海南出版社，2011年版，第97页。
- 37 [宋] 祖琇：《僧宝正续传》卷三，日本续藏经第一辑第二编，中华民国十四年涵芬楼影印，第296页b面。
- 38 [宋] 晓莹：《罗湖野录》卷四，第345、346页。
- 39 [清] 僧慈荣、道林纂：《黄龙崇恩禅院传灯宗谱》上册，乾隆二十七年（1762）黄龙禅寺刻印，第11—15页。
- 40 [宋] 黄庭坚著，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下册，第1484页。
- 41 [宋] 黄庭坚著：《宋黄文节公全集·续集》卷二，第1942页。
- 42 [宋] 黄庭坚著，刘琳、李勇先、王蓉贵点校：《黄庭坚全集》第3册，第1929—1930页。
- 43 [宋] 黄庭坚著，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上册，第646页。